

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LASSO 的筛选方法*

张兴祥 钟 威 洪永淼

内容提要: 国民幸福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文献的幸福指数量表, 本文构建了一套适合于测度我国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 并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为了有效地选择重要变量和消除估计偏差, 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重要统计方法 LASSO 筛选法, 先从 6 个人特征变量和 40 个维度变量中筛选重要变量, 然后再进行回归系数估计与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 ① 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 3 个人特征变量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② 9 个维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分男女、城乡、南北三个组别考察幸福感差异。最后, 提出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国民幸福感; 指标体系; LASSO 筛选; 政策建议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18.11.001

中图分类号: F22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565(2018)11-0003-11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ivil Happiness in China: Based on LASSO Screening Method

Zhang Xingxiang Zhong Wei Hong Yongmiao

Abstract: Civil happines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i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ivil happiness in China based on our survey data. It uses the LASSO method, which is a newly developed important statistical method for effectively selecting important variables and eliminating estimation bias.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it considers 6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and 40 variable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t shows that 3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including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education level and 9 other variables including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self-esteem,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nd lifestyle satisfaction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happiness. Furthermore, it also analyzes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different subsamples partitioned by gender, residence (urban versus rural), or geography (south versus north). Basing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t proposes several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civil happiness.

Key words: Civil Happiness; Index System; LASSO; Policy Suggestion

一、引言

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一直围绕着一个永恒的主题——追求幸福。幸福关系到每个个体的生存

* 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梦的系统结构、操作层面及国际比较研究”(13@ZH020)的资助。

与发展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是民心所向。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近年来,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引下,提高国民幸福感已成为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那么,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感到底处于何种水平,现实中哪些因素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不同群体之间的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提升国民的幸福等等,都是围绕幸福这一宏大主题展开而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相应地,测度国民幸福感、构建国民幸福指数及其评价体系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根据认知的倾向性,幸福大体可归为两类:客观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前者主要以外在标准来界定幸福,后者主要以自我评价来界定幸福。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个体主观的、整体的、综合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评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其直接反映个体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而广受关注。以主观幸福感作为测度工具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方法,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借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美国梦综合指数”(American Dream Composite Index)、Benjamin等(2014)^[1]以及国内学者提出的幸福指数量表,采取模块化、多维度、分层级的设计思路,构建一套适合于测度我国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第二,采用定序因变量的连续比例回归模型(continuation ratio regression model)对国民幸福感数据进行建模,并选用Tibshirani(1996)^[2]提出的LASSO(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方法筛选相关重要变量。已有文献一般不作任何检验、筛选,就直接利用人为设定的变量对国民幸福感进行测度,这是本文异于已有文献的地方。LASSO是一个用于筛选重要变量的新统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回归系数绝对值总和小于一个常数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极大化似然函数使得部分回归系数估计为0,从而达到删除不重要变量和提高模型解释力的作用。第三,在筛选的基础上,本文再用不带惩罚项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总样本回归,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分性别、城乡、南北三个组别来考察不同样本的幸福感差异。第四,根据LASSO筛选出的结果,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现实因素作了简要比较分析与解释,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初,心理学家Brickman和Campbell(1971)^[3]的研究发现,由于人具有适应性倾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未伴随幸福感的相应提高,这是心理学“幸福悖论”的最初版本。随后,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1974)^[4]的一项跨国研究也表明,虽然财富呈现长期增长,但自陈的个体幸福和/或生活满意度却恒定不变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s Paradox),也是经济学“幸福悖论”的最初版本。正是“幸福悖论”,重新激活了古典经济学以来对幸福的探究,Frey(2008)^[5]称之为“经济学的幸福革命”。根据Frey和Stutzer(2010)^[6]的总结,目前主流经济学在幸福研究上呈现三个向度的观念变化:第一,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是可以测量的,并且可以作为效用和个人福利的有效代理;第二,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人类如何评价社会环境,与如何评价商品和服务是一样的;第三,幸福经济学研究能够为国家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国外学者从人的主观精神层面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幸福感理论,其中不少理论还存在多个分支。而考察哪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是实证研究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有的研究者把影响因素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等)、收入或财富、物价(通货膨胀水平)、家庭环境、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文化因素等,是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影响因素(黄立清和邢占军,2005)^[7]。一般的实证研究文献,考察的影响因素数量有限,相比之下,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美国梦综合指数”和 Benjamin 等(2014)^[1]提出的幸福指数,所涉及的影响因素较为广泛^①。

国内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②,主要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领域的学者。近10年来,幸福问题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一股研究热潮。从已有文献看,大部分经济学文献侧重于实证研究,涉及一个或多个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收入、就业、住房、物价、休闲、城市化、环境污染等,代表性研究文献如李涛等(2011)^[8]、罗楚亮(2006)^[9]、闰丙金(2012)^[10]等。

测度主观幸福感,成为幸福研究领域的聚焦点,现已开发出不少测量方法,比较常见的有三种:①自陈量表(self-reported inventories),即由受访者根据调查问卷的问题,自行报告各种情况下自己关于幸福的判断或感受(Aiken,2002)^[11]③;②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即收集每个人在其实际生活环境中一段时间内的真实数据,再将这些数据作为经验进行取样(Schwartz等,1999)^[12];③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对于一天当中特殊的时间段进行评分,以此来“重现”当天的幸福感(Kahneman等,2004)^[13]。本文将采用自陈量表来测量主观幸福感。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还建立不同的幸福感评价体系,如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世界价值观调查学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对于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客观的指标体系,主要由生活中的各种客观因素构成;第二种是主观的指标体系,由人们的主观认知、情感等因素构成;第三种是将客观与主观因素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既涵盖了显示物质资源充足程度的指标,又有评价主观满意程度的指标。一些学者也尝试构建了用于评价我国国民幸福的指标体系,如陶涛等(2014)^[14]分四大维度35个分指标建立家庭幸福发展指标,郑方辉等(2015)^[15]建立了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9个的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指标体系。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梦综合指数”、Benjamin等(2014)^[1]以及国内学者提出的幸福指数量表来选择相关变量(影响因素),构建一套适合于测度我国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展开全国性的实地调查以获取样本数据。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有研究未对主观设定的指标进行检验、筛选就直接运用于国民幸福感的测度,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值得怀疑,本文将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三、问卷设计与数据描述

(一)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本文参考了国内外幸福感研究领域著名的量表,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设计。问卷

① “美国梦综合指数”主要包括经济、幸福、社会性、多样性和环境五大模块内容。参见 <http://www.americandreamcompositeindex.com/>。而 Benjamin 等(2014)提出的幸福指数,主要涉及家庭、健康、安全、价值观、自由、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② 国内研究文献中,幸福、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这三个词语经常混用,在一般情况下,三词意思相近。

③ 几种常用的自陈量表包括总体满意感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夏普量表(Short Happiness and Affect Research Protocol, SHARP)、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Newfoundland Scale Happiness, MUNSH)、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 ABS)、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 PGCMS)、中国人幸福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CHI)。

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等基本情况,以及总体幸福感这一最重要的指标。

问卷将国民幸福感划分为 5 个量级^①,包括“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赋予对应的数值 1、2、3、4、5,数值越大表示幸福感越强。问卷第二到第七部分主要考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主客观因素,分六大维度,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系、健康状况和环境状况。第八部分要求受访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按影响总体幸福感的程度,对上述六大维度进行排序。第二到第七部分问卷内容按三级指标进行设计,一级指标 6 个,二级指标 17 个,三级指标 40 个,包含 10 个客观变量、30 个主观变量,具体分级指标见表 1。

表 1 分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生活	居民收入	个人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	人际关系	个人交际状况	家庭生活满意度 社会关系满意度 社交活动兴趣度
	居民消费	每月基本消费支出 当地物价水平			社会影响因素
	居民住房	家庭住房面积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是否拥有住房产权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	
	居民财产	家庭经济状况评价 家庭经济地位评价 购买保险种类数			医疗状况
政治生活	为人民服务水平	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 政府行政水平满意度 司法公正程度满意度	心理健康	自然环境状况	近期积极情绪感受频率 近期消极情绪感受频率 自我价值评价
		政府透明度 政务公开程度满意度			社会环境状况
	政府公信力	基本政治权利满意度	环境状况	社会环境状况	
	民主保障	是否信奉某种宗教 每周闲暇时间 当地文化活动的满意度			子女教育满意度
文化生活	文化活动	是否信奉某种宗教 每周闲暇时间 当地文化活动的满意度			
	教育资源	子女教育满意度			

依照六大维度的划分,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置六个模块的问项。在每个模块的问项中,先提出若干个与各维度三级指标相关的问题,然后以一个该维度满意度的问项作结。问卷设计出来后,我们还通过预调研获取 100 份样本数据,及时发现问卷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反复讨论修改,确保正式问卷的合理性和易读性,以及研究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同时,为了保证调研覆盖东、中、西部地区,确保有效问卷数量,我们随机抽取了 23 个省市,并招募、培训 20 名调查员,以“一对一、面对面”的调查形式获取相关数据。问卷调查共发放 2200 份,实际完成、收回 2136 份,剔除信息有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数为 2007 份。

(二) 内部一致性检验和效度检验

在处理数据时,本文需要根据内部一致性检验来判断问卷的不同部分所测量的概念是否统一,以检验问卷设计的可信度和合理性。Cronbach α 系数是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信度系数,它适用于测验多个结果以多值记分的情况,且多用于主观性调查,与本文的调查情况相符。Cronbach α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① 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是最常用的一种评分加总式量表,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 1932 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 1、2、3、4、5,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总和。

$$\alpha = \frac{k}{k-1} \left(1 - \frac{\sum S_i^2}{S^2} \right) \quad (1)$$

其中 k 为问卷所包含的问题数目, S_i^2 为每一问题所得数据的题内方差, S^2 为问卷全部问题所得数据的总方差。Cronbach α 系数取值在 0~1 之间, 取值越高表明问卷调查的信度越高, 内部一致性越好。由于问卷涉及的问题分为六大维度, 因此先计算出各个维度的 α 系数, 然后再计算总的 α 系数。表 2 展示了问卷调查六个维度和总体的 Cronbach α 系数。六个维度的 α 系数均在 0.7 以上, 而总体的 α 系数高达 0.83, 说明该问卷调查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表 2 内部一致性可信度检验

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	问项数目
经济生活	0.75	10
政治生活	0.90	7
文化生活	0.72	6
人际关系	0.74	6
健康状况	0.74	8
环境状况	0.86	9
总体	0.83	46

问卷调查的效度用于衡量测量结果与试图测量的目标之间的相近程度, 通常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评价问卷的效度, 其目的是了解属于相同概念的不同问卷项目是否集中在同一个公共因子中。KMO 测度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是通过比较观测原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来判断原始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统计检验方法。KMO 测度取值在 0~1 之间, 取值越大说明原始变量的相关性越强, 越适合作因子分析。实际经验表明, KMO 测度大于 0.8, 意味着因子分析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此外, Bartlett's 球形检验可用于判断原始变量是否相互独立。实际分析中, 因子分析要求 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卡方检验值必须达到显著水平, 对应的 P 值要小于 0.05。表 3 显示,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 KMO 测度的结果为 0.88, Bartlett's 球形检验对应的 P 值接近于 0, 说明原始变量适合于作因子分析, 进一步说明该问卷调查具有很好的效度。

表 3 效度检验: KMO 测度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

KMO 测度	Bartlett's 球形检验
0.88	卡方检验量 = 26646.91 自由度 = 1035 P 值 < 2.22e - 16

(三) 数据描述

在 2007 份有效问卷中, 女性占 48.72%, 男性占 51.28%, 与我国目前的男女比例基本一致。与此同时, 受访者的年龄结构、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居住地区等分布特征, 也基本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应的分布比例相符, 这说明调查样本的采集符合我国的人口特征, 调查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根据问卷的调查结果, 分别计算各维度满意度、总体幸福感以及分样本(分性别、城乡与南北)①的比重分布, 结果如表 4。

从各维度的满意度比重看,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环境状况 4 个维度均集中于“一般”, 所占比重在 50% 以上; 而人际关系、健康状况两个维度“比较满意”的比重最高, 占了将近一

① 城乡划分以受访者常住地点为依据, 南北划分以长江为界, 长江以北为北方, 长江以南为南方。性别、城乡、南北均采用虚拟变量: 1 表示男性 0 表示女性; 1 表示城市 0 表示农村; 1 表示南方 0 表示北方。

表 4 各维度满意度、总体幸福感及分样本幸福感的比重分布 (%)

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经济生活	3.29	16.89	51.77	26.11	1.94
政治生活	2.29	12.36	59.24	23.72	2.39
文化生活	1.49	10.41	55.06	31.14	1.89
人际关系	0.45	3.54	43.00	48.98	4.04
健康状况	0.45	5.28	37.82	47.58	8.87
环境状况	1.44	10.61	53.01	32.69	2.24
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总体	1.54	3.54	32.34	45.74	16.84
男性	2.04	3.79	33.92	44.41	15.84
女性	1.02	3.27	30.67	47.14	17.89
城市	1.20	3.11	32.65	46.50	16.54
农村	2.36	4.56	31.59	43.92	17.57
南方	1.97	4.12	36.53	43.33	14.06
北方	1.01	2.81	27.08	48.76	20.34

半。六大维度中,受访者感觉“非常满意”的,健康状况排在首位,占 8.87%;其次是人际关系,占 4.04% 其他维度均低于 3%。

表 4 表明,有 32.34%和 45.74%的受访者分别报告自己属于“一般”和“比较幸福”的状态,其中报告自己“比较幸福”的受访者所占比重接近总体的一半。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大致处于“比较幸福”的状态,民众对生活的综合满意度较高。另外,有 16.84%的受访者幸福感程度非常高,同时也有约 5%的受访者感到不幸福,其中 1.54%的受访者感到“非常不幸福”。

对比一下各维度的满意度与总体幸福感,本文发现,受访者报告“幸福”的比重为 62.58%,均高于相应的各维度“满意”(包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重,特别是大大超过经济生活的满意度(28.05%)和政治生活的满意度(26.11%)。分样本的总体幸福感也同样高于按六大维度划分的满意度比重。郑方辉等(2015)^[15]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由此可见,受访者对生活总体上的幸福感受,不是问卷中六大维度中的任意一个所能概括的,即人们对于幸福的总体感受,也绝不仅仅由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任何一方面单一决定。不过,表 4 只是依据调查问卷描述了国民生活满意度和总体幸福感的概貌,至于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对幸福感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则是下文要探究的重点。

四、模型选择与实证分析

(一) 模型选择

由于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源自于人们对自身综合情感体验的整体判断,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本文将问卷调查结果中的总体幸福感作为实证分析的唯一被解释变量(因变量)。该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定序随机变量,因此本文选择定序因变量的连续比例回归模型对该数据进行建模。

假设定序因变量 Y 具有 K 个有序类, X 表示 p 维的协变量,连续比例模型对条件概率 $\delta_k(x) = P(Y = k | Y \leq k, X = x)$ 的对数比(logit)进行如下建模,对于任意的 $k = 2, 3, \dots, K$, 有:

$$\text{logit} [P(Y = k | Y \leq K, X = x)] = \log \left[\frac{P(Y = k | Y \leq K, X = x)}{P(Y < k | Y \leq K, X = x)} \right] = \alpha_k + \beta^T x \quad (2)$$

从而:

$$\delta_k(x) = P(Y = k | Y \leq K, X = x) = \frac{\exp(\alpha_k + \beta^T x)}{1 + \exp(\alpha_k + \beta^T x)} \quad (3)$$

式(3)表示,在给定某样本属于 k 类以及比 k 类更低类别的条件下,该样本正好属于 k 类的条件概率。进一步,本文得到连续比例模型的似然函数表示式:

$$L(\alpha_2, \dots, \alpha_k, \beta | Y = y, X = x) = \prod_{i=1}^n \{ \prod_{k=2}^K [\delta_k(x)]^{y_{ik}} [1 - \delta_k(x)]^{1 - \sum_{j=k}^K y_{ij}} \} \quad (4)$$

式(4)中,如果第 i 个样本属于第 K 类,那么 $y_{ik} = 1$; 否则 $y_{ik} = 0$ 。如果不需要进行变量选择且当样本个数 n 大于协变量维度 p 时,极大化似然函数式(4)可以得到回归系数的极大似然估计。当模型的重要协变量不能确定或者 $p > n$ 时,需要采用一种带有惩罚项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来筛选重要变量。针对此类问题, Tibshirani (1996) [2] 提出了著名的 LASSO 方法。Archer 和 Williams (2012) [16] 进一步将 LASSO 方法推广到了定序因变量的连续比例模型,通过极大化如下带 LASSO 惩罚项的似然函数,估计回归系数并进行变量选择,即:

$$\max_{\alpha_2, \dots, \alpha_k, \beta} [L(\alpha_2, \dots, \alpha_k, \beta | Y = y, X = x) - \lambda \sum_{j=1}^p |\beta_j|] \quad (5)$$

式(5)中 λ 是控制变量压缩程度的调节系数。LASSO 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添加惩罚项,将不重要变量的回归系数直接估计为 0,从而达到剔除不重要变量的目的。当调节系数为 0 时,式(5)变为了一般的极大似然估计;当调节系数足够大时,极大化式(5)将迫使所有回归系数估计为 0。在实际数据分析中,可以通过贝叶斯信息准则(BIC)、Akaike 信息准则(AIC)或广义交叉验证值(GCV)等模型选择标准来选择最优调节系数 λ 。本文采用 BIC 方法来选择调节系数。此外,由于 LASSO 惩罚项对每个回归系数都进行了惩罚,所以回归系数估计量是有偏的(Fan 和 Li, 2001) [17]。为了有效地消除有限样本下的估计偏差,本文利用如下两阶段估计方法:第一阶段,采用带 LASSO 惩罚项的似然函数方法筛选出重要变量;第二阶段,对已选中变量建立无惩罚项的连续比例模型,再利用一般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到一致的回归系数估计以及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结果。

(二) 总样本回归

考虑到本文所用数据由问卷调查采集得到,而问卷内容所包含的指标都是人为设定的,因此不能确定它们是否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切实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上述带有 LASSO 惩罚项的似然函数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回归结果见表 5。在总样本回归中,本文从 46 个协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婚否、学历水平等 6 个人特征变量)中筛选得到 17 个重要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 3 个,六大维度三级指标变量 14 个。

表 5 总样本回归结果

维度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维度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个人特征	性别	-0.19** (0.08)	人际关系	家庭生活满意度	0.83**** (0.07)
	婚否 ^①	0.35**** (0.09)		社会关系满意度	0.14* (0.08)
	学历水平 ^②	0.12*** (0.04)		社交活动满意度	0.12** (0.06)
经济生活	家庭经济状况评价	0.07 (0.05)	健康状况	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	0.17**** (0.05)
	家庭经济地位评价 ^③	0.22**** (0.07)		积极情绪感受频率	0.13** (0.06)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0.08 (0.06)		消极情绪感受频率	-0.14* (0.07)
政治生活	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	0.25**** (0.06)	环境状况	自我价值评价	0.31**** (0.07)
	基本政治权利满意度	0.03 (0.06)		生活便利满意度	0.05 (0.06)
文化生活	子女教育满意度	0.08 (0.06)			
样本量	2007				

注: 括号内表示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0.1%、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 ① 婚否“1”表示处于婚姻状态(结婚、再婚)，“0”表示不处于婚姻状态(未婚、同居、离婚、丧偶)。
- ② 学历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含技校)、高中(含中专、职高)、大学(含专科)、硕士及以上,分别赋值 1、2、3、4、5。
- ③ 分“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5 个档次。

国民幸福感可能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即多因性。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3个变量通过了LASSO筛选且统计上显著,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幸福感更强,已婚个体比未婚个体幸福感更强,高学历者比低学历者幸福感更强。而年龄、民族和政治面貌这3个变量均被LASSO方法直接剔除了。六大维度中共有14个重要变量被LASSO方法选中,其中有9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家庭经济地位评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4个变量在5%或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值得一提的是,这9个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重要变量均为相对的或主观性的指标。

经济生活维度共10个变量,只有家庭经济状况评价、家庭经济地位评价、家庭拥有房产数量3个变量被LASSO方法选中,其中家庭经济地位评价对幸福感产生重要且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其他变量均未对幸福感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罗楚亮(2009)^[1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本文的回归结果却不支持这一结论。另外,个人自评的档次与幸福感强度成正比,受访者认为自己家庭经济在当地所属的相对档次越高,幸福感越强。

政治生活维度共6个变量,其中有2个变量被LASSO方法选中,但只有社会保障满意度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社会福利保障最为举足轻重,它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与国民幸福感的关联度最大。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可以为民众解除许多后顾之忧,相当于为他们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幸福防线”。

文化生活维度共4个变量,只有子女教育满意度这一项通过LASSO方法筛选但统计上不显著。“知识改变命运”是相当一部分人读书的动力。然而,教育具有明显的工具导向色彩,是人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对大多数父母来说,子女教育只是阶段性的任务,因此,教育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人际关系维度共5个变量,其中有3个通过LASSO方法筛选且统计上显著。家庭生活满意度是人际关系变量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突出的一个,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家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一个人的幸福感。如果说家庭是一个缩小的社会,那么,社会相当于一个放大的家庭。与外界人际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及幸福感。至于社交活动,可视为个体为了维持互相依存的社会关系而做出的一种“感情投资”,它对一个人的幸福感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健康状况维度共8个变量,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且显著的刚好达到一半。对幸福感有实质性影响的是对个人生活方式、情绪感受和自我价值的评价,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价值评价。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理想、抱负、自我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那么他(她)就能感受到相应程度的快乐和满足(幸福)。

环境状况维度共8个变量,只有生活便利满意度通过LASSO方法筛选但统计上不显著。环境因素何以对国民幸福感影响不大?可能性的解释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水平仍然较低,国民对于环境生活的关注度还不是很,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尚未达到能影响幸福感的程度。

(三) 分样本回归

接下来,本文分男女、城乡、南北三个组别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男女、城乡、南北三个组别样本通过LASSO筛选的变量数量及显著性均存在一定差异。从个人特征看,男女样本已婚的幸福感要比未婚的强(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学历对男性的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学历层次越高,幸福感越强。城市居民在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这3个人特征变量中呈现出显著的幸福感受差异,且与总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而农村居民则否。南方居民在学历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幸福感受差异,北方居民则否。相反地,北方居民在

表 6 分样本回归结果

维度	解释变量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南方	北方
个人特征	性别			-0.16 [*] (0.10)			-0.36 ^{***} (0.12)
	婚否	0.34 ^{***} (0.12)	0.41 ^{***} (0.13)	0.43 ^{****} (0.11)			0.35 ^{***} (0.14)
	学历水平		0.16 ^{**} (0.06)	0.11 [*] (0.06)		0.10 [*] (0.06)	
经济生活	家庭经济状况评价		0.18 ^{**} (0.08)	0.11 [*] (0.06)		0.11 [*] (0.07)	
	家庭经济地位评价	0.32 ^{****} (0.09)	0.15 (0.11)	0.04 [*] (0.09)	0.54 ^{****} (0.12)	0.27 ^{***} (0.09)	
	家庭房产拥有数量		0.16 [*] (0.09)		0.18 [*] (0.11)	0.12 ^{**} (0.06)	
政治生活	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	0.28 ^{****} (0.07)	0.19 ^{**} (0.09)	0.24 ^{****} (0.07)	0.30 ^{***} (0.10)	0.23 ^{***} (0.07)	0.32 ^{****} (0.08)
	基本政治权利满意度		0.16 [*] (0.08)	0.03 (0.07)	0.04 (0.10)		0.01 (0.09)
	当地文化活动满意度	0.04 (0.08)			0.05 (0.11)		
文化生活	子女教育满意度	0.12 (0.08)		0.05 (0.07)	0.14 (0.11)		0.10 (0.08)
人际关系	家庭生活满意度	0.75 ^{****} (0.09)	0.91 ^{****} (0.10)	0.87 ^{****} (0.08)	0.78 ^{****} (0.11)	0.86 ^{****} (0.09)	0.76 ^{****} (0.10)
	社会关系满意度	0.12 (0.11)	0.21 ^{**} (0.11)	0.23 ^{**} (0.09)		0.12 (0.10)	0.15 (0.12)
	社交活动满意度	0.14 [*] (0.08)	0.13 (0.09)	0.15 ^{**} (0.07)		0.09 (0.08)	0.14 (0.09)
	个人社会地位评价						0.21 [*] (0.11)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评价		0.16 ^{**} (0.08)				0.18 ^{**} (0.09)
	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	0.24 ^{****} (0.07)		0.23 ^{****} (0.06)		0.23 ^{****} (0.07)	0.08 (0.08)
	积极情绪感受频率	0.13 (0.08)		0.20 ^{**} (0.08)		0.14 [*] (0.08)	
	消极情绪感受频率			-0.15 (0.09)			-0.31 ^{***} (0.12)
	自我价值评价	0.20 ^{**} (0.09)	0.52 ^{****} (0.10)	0.30 ^{****} (0.08)	0.33 ^{***} (0.11)	0.22 ^{***} (0.09)	0.42 ^{****} (0.10)
环境状况	生活便利满意度				0.11 (0.09)	0.10 (0.07)	
	空气质量评价	0.03 (0.06)					
样本量		1029	978	1415	592	1117	890

性别、婚否上存在显著的幸福感受差异,南方居民则否。六大维度中,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在 3 组比对的样本中均是高度显著的,而其他变量存在一些显著差异。例如家庭经济地位评价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只对男性的幸福感受有显著影响,对女性则否,女性更在意社会关系满意度和身体健康状况评价。就获得幸福感受而言,城市居民更在意社会关系满意度、社交活动满意度、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和积极情绪等这些非物质性的因素,而农村居民更在意家庭经济地位评价、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这些偏向物质性的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评价、家庭经济地位评价以及家庭房产拥有数量对南方居民的幸福感受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北方居民则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全国性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国民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从国民幸福感的五个量级看,报告自己“比较幸福”的受访者占45.74%，“非常幸福”的占16.84%，二者加起来超过六成,说明现阶段大多数国人感受到的幸福感水平是较高的。当然,也有5%左右的受访者感到不幸福。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看: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3个人特征变量在幸福感上呈现显著的差异;9个维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分男女、城乡和南北样本进行考察,本文发现不同比对样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差异还非常明显。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幸福感是一种基于自我认知和综合评价而产生的情感体验,相对量值或主观评价对其影响更为直接,或者说,心理因素比纯粹的物质因素作用更大;个体受到心理参照系的重要影响,幸福感有时是在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中产生的;越是与个体切身利益(包括情感)攸关的,与幸福感的关联度越大;越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个体的幸福感越强。

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现在从政府到民间、从组织到个体都越来越重视发展的质量,尤其是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也离不开社会 and 个人的积极参与,毕竟,全面深化改革事关每个人的幸福,只有合力打造,才能梦想成真。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国民幸福感要着力于构建温馨和谐的“家文化”。“家”是人内心深处的根,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家庭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乃至社会幸福的坚实基础。因此,要进一步强化社区组织的功能,提升社区的文化导向和服务水平,尤其要重视家庭的“上层建筑”——把“家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二,提高国民幸福感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养老担忧成为城乡家庭的共同困扰^①。所以,在推进养老保险城乡统筹以及加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的基础上,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应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为全民构筑一道更为牢固的“幸福防线”。

第三,提高国民幸福感要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创造公平教育、平等竞争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梦想。

第四,提高国民幸福感要下大力气缩小贫富差距。幸福感往往是以外部为参照、在对比中产生的。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突出初次分配机制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重新厘定资本收益、劳动收益与政府税收三者之间的合理比例,在再分配环节要更突出公平公正原则,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

第五,提高国民幸福感要重视健康工程建设。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使人的身心处于愉悦、舒畅的状态,健康生活是一切幸福的基本前提。国家层面应把防控疾病的关口前移,加大预防环节的投入力度,同时要在全民中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出于控制医疗费用大幅攀升的需要,也是提高国民幸福感的需要。

总之,国民幸福感从抽象概念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代表时代观念的重要转向。“幸

^① 李晓宏.《影响中国家庭幸福的几个重要因素》,《人民日报》2014年5月20日。

福经济学的革命”使经济学研究回归人本主义的传统,它重新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究竟为何的命题。在实践维度上,以国民幸福作为政府施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着力点所在。

参考文献

- [1] D Benjamin, M Kimball, N Szembrot. Beyond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Toward Well-being Indices Based on Stated Prefer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9): 2698 - 2735.
- [2] R Tibshirani. Regression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via the Lasso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B*, 1996, 58(1): 267 - 288.
- [3] P Brickman, D Campbell.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 [A]. In H Mortimer (ed.).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A Symposium*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 [4] R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 In P Davis, M Reder (eds.). *Nation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C].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2001.
- [5] B Frey. *Happines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8.
- [6] B Frey, A Stutzer. Happiness: A New Approach in Economics [J]. *CESifo DICE Report*, 2010, 8(4): 3 - 7.
- [7] 黄立清, 邢占军. 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3): 29 - 33.
- [8] 李涛, 史宇鹏, 陈斌开. 住房与幸福: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J]. *经济研究*, 2011(9): 69 - 82.
- [9] 罗楚亮.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J]. *经济学(季刊)*, 2006(3): 817 - 840.
- [10] 闰丙金.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J]. *统计研究*, 2012(10): 64 - 72.
- [11] L R Aiken. *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Assessment* [M]. New York: Allyn & Bacon, 2002.
- [12] J E Schwartz, et al. Does Trait Coping Exist? A Momentary Assessment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Trai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7(2): 360 - 369.
- [13] D Kahneman, et al.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J]. *Science*, 2004, 306(5702): 1776 - 1780.
- [14] 陶涛等. 家庭幸福发展指标构建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4(1): 63 - 76.
- [15] 郑方辉, 卢扬帆, 覃雷. 公众幸福指数: 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2): 68 - 82.
- [16] K Archer, A Williams. LI Penalized Continuation Ratio Models for Ordinal Response Prediction Using High-dimensional Datasets [J].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012, 31(14): 1464 - 1474.
- [17] J Fan, R Li. Variable Selection via Nonconcave Penalized Likelihood and Its Oracle Propertie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01, 96(456): 1348 - 1360.
- [18]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J]. *财经研究*, 2009(11): 79 - 91.

作者简介

张兴祥,男,200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微观计量、人力资本投资、国民幸福测度。

钟威,男,2012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维数据分析、大协方差矩阵估计。

洪永淼(通讯作者),男,1993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组部“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和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金融计量经济学。

(责任编辑: 郭明英)